

地方党史資料

名称:

类别:

作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102

一九一八年十月滿鐵沙河口工厂中国工人罢工情况的联合回忆

李安庆 李云中 刘逢忠

旅大市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大連機車車輛厂党委宣傳部

1962年5月

关于山东沙河口工厂一九一八年十月中国工人大罢工

问题的核实意见

1. 关于罢工的起因、领导人及罢工经过和后来敌人采取阴谋手段等问题，除该三位老工人的回忆一致外，当时罢工领导人之一，刘玉柱（退休老工人）也有相全的回忆，且当时的泰东日报（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也有报导：“沙河口工人因金票落价，生活困难于前两星期有杨某、刘某、王某等 见厂长，请求增长工金，当经厂长谕令俟一星期即当示…… 星期已过当局卒未发表，因此各工人大动公愤，即于七日中午八时机关盟罢工……”故予以认定。

2. 关于罢工期限与结果问题

据老工人回忆普遍说：此次罢工没闹好，这次罢工共坚持六、七天，可是有的在罢工两三天后就破晓上班了，还有的歇了二十天才上班。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工人坚持罢工六、七天才上班，因此，说罢工七天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予以认定。

关于一九一八年十月滿鉄沙河口工場

中国工人罢工情况的回忆

(按：李安庆，共产党员，大連機車車輛工厂退休老工人，現大連市沙河口区兴工分社机械厂車間主任，一九一七年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过一九一八年十月的大罢工。)

李云中，共产党员，大連機車車輛工厂模製車間工人，一九一八年十月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了当年的大罢工。

刘逢忠，大連機車車輛工厂機車車間走台工段工人，一九一七七年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过一九一八年十月的大罢工。)

我們几个人，都是差前差后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干活的。那時，这个工厂正包攬鞍山制鉄所的活，由于活很忙，工厂十天半月就上一次人，當時厂里人很多也很乱。中国工人大約有两千多人，日本工人有两千四、五百人。那時候中国工人干手艺活的不多，絕大多數是抬抬扛扛的体力劳动，挣钱很少。就是有較好手艺的大工匠，也仅能挣上七、八角钱金票（日本币），一般的中国工人只挣三、四角钱，徒工才挣一两角钱，大家生活都很苦。那時，单身汉还勉强可以維持生活（只能吃苞米餅子吃咸菜），若是有家带口的就更難維持了一月工钱半月即花光。

那時候，市面流通的是“小洋”钱，挣的金票不能直接上市里买东西，需兌換后方可使用。如果一元金票能兌換一元“小洋”还好說，可當時并无保証，金票与“小洋”常出差額，往往挣一元钱金票，拿到市場仅頂几角钱（因一元金票只兌換几角“小洋”）用。一九一八年的九、十月間，金票大跌价，一元钱金票只能換三、四角小洋，而且當時的钱由老板們还不太愿兌換。在兌換時，有時还能遇上假（伪造）钱，这样也就吃亏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四老”①领导的这次大罢工，就是因金票跌价，为了要求长工钱而引起的。由于金票跌价，工友们仍持原薪，全厂工人生活显著下降。当时，在厂子里到处可听到这样些愤慨的议论：“天冷了，金票不值钱，咱都顾不上，到了冬天可怎么办呀！”“冬天可不是夏天，没有棉衣怎么过冬！”“反正是过不下去了，干脆罢工（罢工的意思）算啦！”“对！我们都不干，要厂子叫，大老板，厂长（日寇厂长横井的绰号）给长工钱……”大家叹气，不满，气愤。就在这时候，翻砂厂以刘老（刘玉柱）、曹老（曹俊德）、和铜炉的杨老（杨振和）还有铜炉厂的王老（王茂林）等大工匠，见到大家因金票落价造成生活困难而不满的情绪，就经常到一块串通并向厂长（车间）的日本工头提出长工钱的要求。但日本工头很狡猾，采取着一拖再拖的办法，后来“四老”就领我们推选代表在罢工前的两个星期见了“大老板”厂长，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大老板”厂长问：“你们谁是头目人，出来说话的好”。并要我们大伙联名提出申请书，一周后给答复，其实我们早就识破敌人的阴谋。敌人是想找出我们的领头人，破坏这次罢工。为了不让“大老板”厂长查找出我们的领导人，杨老提议采取画圈圈的匿名办法，叫他累穿狗眼也找不出我们的头目人来。申请书递上去，一周二周过去了还是一点信没有。这时候“四老”等大工匠又找厂长质问。“大老板”不仅不答应反而说：“支那人苦力的有的是，不干拉倒。”这使“四老”等大工匠更为气愤，回来和我们一说，可把我们气炸了，都嚷嚷要罢工（罢工）。

十月六日这天，吃晌饭的时候，杨老来到翻砂厂找刘老、曹老一商谈，便对我们讲：“有个地方（何地已记不清）工人们罢工胜利了。咱们要想长工钱，不罢工鬼子是不能答复的。从明天起咱们也给他来个罢

厂子……。”为長工续而罢工正符合我們的心愿，当然了，也有少数人胆小怕事不大全意，就这样，罢厂子的消息就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开了。这天晚上在沙河口候家沟小山上，楊老和几个大工匠召集我們住在香炉礁、候家沟一带的工友开一次大会。楊老在会上讲：“大家伙要抱在一块不上班，团结成一条心罢工就能胜利。”最后嘱咐我們：“这次开会千万 别叫鬼子知道。”在全一天晚上，王老在沙河口双庙子（現景興街）也召开了全样的大会。

第二天早晨，知道罢工的人都不上班了。由于这次罢工組織的不严密，有不少人不知道罢工的事，还和往常一样上班干活，到了工厂大門才听说罢工了，便停在門外看情况听动静。罢工的人越来越多都聚在門口，門卫还一个劲的叫工人进厂干活，可是誰也不听他的。这时，干夜班的工友和不知道罢工而早出厂的工友，都冲出了工厂大門，和外边的人汇合了。日寇看門口站了千八百人不进厂干活，便叫看門的“韓老歪”（韓丕元，是敌伪爪牙）出来劝工人干活，可是誰也不听他叫唤，直到九点多钟才各自散去。日寇看中国人真的罢工了，当天就派一些日本工头到工友家去找人干活，我們大家伙早已躲起来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被欺骗，第二天上了班。

罢工的第二天（十月八日），为了防止少数不愿罢工的人上班破坏罢工，有尹媽媽（本名：尹生祥）(2)领着人拿着棍棒，堵在通往工厂的要道口上，劝说上班的工友不要进厂干活。就在这时候，小包工头“明嗑吧”招了二百多名临时工想进厂干活，被尹媽媽他們把“明嗑吧”打跑了，又把临时工劝说回去了，此时，敌人的野蛮家暴露了，派出大批軍警，在大街上，或到工厂附近的工友家去捉人，强迫工人上班。当我们知道这一消息后就相互傳告，来得及的都到亲戚朋友家躲起来了，躲

不及的人被逼进厂干活。还有的被捉后，由于拒绝进厂干活就被关押起来。后来，日寇知道这次罢工是“四老”领头闹起来的，就派警察到他们家去捉人，得知消息早的刘老、曹老就逃回原籍天津。杨老和王老还有几个大工匠未来得及躲起，就在罢工的第二天被捕了。敌人满以为捕去几个罢工领导人和坚决罢工的工友，我们就被迫复工，其实，小日本鬼子的算盘打错了，我们并不那么弱，头目人虽然是被捕的被捕，躲的躲了，可是我们还是不上班。这时日本工头就用欺骗流氓手段，到工友家说：“别人都上班了，你为什么还不上班。”由于组织的不严密，再加上鬼子欺骗造谣，结果有的工友便轻易的相信了。因此，在第三天（十月九日）才有人陆陆续续上班了，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又坚持了好几天，后才陆续上班了。

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就上班干活了。“四老”领导的大罢工就这样没能取得多大收获而失败了。尽管当时没给我们长工钱，可是后来不久日本资本家害怕我们再闹罢工斗争也怕日本工人闹事，就给中国工人每人每天长了一角钱，有的长了几分钱，日本工人也长了钱。刘老、曹老被工厂开除了，其实他俩走后就没准备再来侍候小鬼子。杨老和王老他们被关押了两个月才释放出来，出狱后，我们大伙又都自愿的捐了些钱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回忆人 季 安 庆（印）

季 云 甲（印）

刘 逢 忠（印）

註：(1)当时工人有个习惯，对有威望受尊敬的工人，不叫其名，光称姓再加上个“老”字。“四老”是杨老～杨蕴和，王老～王茂林，曹老～曹俊德、刘老～刘玉柱。

(2)尹媚媚：本名叫尹生祥，由于他很体贴工友，爱打不平，每逢年节聚会，好扮个老婆婆，因此，工友给他个绰号为尹媚媚。

关于一九二〇年五月
滿鐵沙河口工厂中日工人联合罢工的回忆

刘金有 刘振泉 司春运

旅大市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大連機車車輛廠黨委宣傳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

关于几个問題核实認定的主要根据

这分联合回忆条的基本情节，經過老工人邹义順、刘洪华等回忆旁証一致。其次，关于罢工的起因、時間、經過和結果等，敌伪报刊資料也有記載。如滿蒙全書（第六卷第三編第三章第三节）的“在滿日工人的劳动糾紛”中，关于“沙河口工厂勞資糾紛的經過”，里記載：“大正九年（1920年）上半年，滿洲經濟界受日本內地經濟肖条的影响，也呈現了不夠活潑的状态……滿鐵創立十年來未有进行人員整頓……趁此机滿鐵要裁各部人員。这一消息還沒正式发表前，傳到沙河口工厂的时候，職工們即感到不安和激憤，在工作時間內不干活，三、五成群的秘密談論如何对付的办法……。”另据日本“現代支那劳动研究”，記載：“大連沙河口滿鐵工厂，从五月一日开始至六月十日罢业四十天，六月十一日复工。”再据大正九年六月二日的辽东新报第二版报导：“……在一日正午訪問了橫井工厂長，其結果公司将免職日本職工五百四五十名，中国工人一千三百多名，退職津貼大正六年（1917年）以前入社的按照70%，大正六年以后的按30%发給，宿舍決定延期两个星期……。”等等，均与此回忆条大体相全，予以認定。

关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至六月十日）

滿鉄沙河口工厂中日工人联合罢工的回忆

（按：刘金有，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大連機車車輛厂工人，共产党员。刘振全，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大連機車車輛厂工人，共产党员。司春运，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該連機車車輛厂退休工人，共产党员。）

从我們入滿鉄厂干活，赶上好几次罢工事件。有的罢工是中国人干的，有的是日本工人为反对資本家的剝削而干的；規模有大也有小。那个时候我們对罢工的意义还都不大明确，只知有人鬧起来，咱就跟着参加，反正不罢工也活不下去，罢工好了还能爭得些权利。在我們的记忆里，除一九一八年中国工人的大罢工和一九一九年六、七月日本工人那次罢工的規模（四、五百人，罢工五、六天）較大而外，其它几次規模都較小，記憶的也不清楚。現在回忆起来，規模最大（人数与罢工時間）的还要算一九二〇年五月这次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全厂五千余名中日工人联合干起来的。这次罢工虽說是自发的，没有什么組織領導，只是中日工人的心都很齐，斗争的积极性也很大，因此，罢工坚持約四十多天。罢工原因，是因为工厂沒有活（受日本内地經濟危机的影响），資本家眼看开不了餉，要大批裁人而引起来的。

罢工的前几年，滿鉄工厂包鞍山制鉄所和鈴木油厂的活，招收了很多工人，到一九二〇年活干完了，工厂只是修理几台破火車头（機車）和貨車，因此就显得活少人多。这时候，市面上也很不景气，可以說經濟危机已在“关东州”表面化了。工厂开工的少了，大小工厂都在裁人。資本家为維持殘局，先是采取降低工資的手段，后又规定每星期休息两天不发工錢，以填補其亏损。到四月里，工厂就揚言要大裁人。起初我

們只知道裁中國人，當得知此消息後，大伙都沒心思干活，後來干脆扔掉工具不干活了，成天三個一羣五個一伙的談論這件事。本來中國工人掙那幾個工錢糊口都難，一旦被裁減下去，那真是得瞪眼挨餓了。所以，儘管日本工頭吵吵叫叫督促我們干活，也沒人去理他，甚至還有的頂撞地說：“不要我們了還干什么活！”旋盤廠一個姓徐的小伙子，就手指着日本工頭說：“你要把我裁了，我非砸碎你的腦袋不可！”弄的工頭無法只得說：“廠長的來了就干干，若不然我的不好交待。”後來大家越議論越氣憤，說什麼也不听了，上班後就睡覺的睡覺，玩的玩，要不就在各廠（車間）里找熟人打听消息。

大約是在四月底五月初，咱中國工人正鬧着很強烈的时候，日本工人也聽到消息，說他們也要被裁。全時，他們還看到從鞍山制鐵所被裁下來的日本工人，已經拉家帶口的來到大連，準備坐船回國，這使日本工人也大为不滿起來。他們就把機器停了，工具扔了，和中國工人一道要起工了。有些日本工人，氣憤地罵日本資本家心腸太狠毒：用人就從國內給招來，不用時就一脚踢開不管。有的日本工人就找中國工人朋友，打听中國工人過去罷工的經驗，和一块商議怎樣反對工廠裁人。這樣的事個個廠（車間）都有；象翻砂廠就有牛島等日本工人找于景龍大工匠們打听中國工人一九一八年罷工的情況；台車廠的橫山，旋盤廠的若本等日本工人，也是成天和中國工人聚在一起議論罷工的事情。大伙認為過去罷工不進廠子，廠方不給工錢，這次罷工經大家研究，要進工廠但不干活，還要叫廠方給開工資。不過當時還有極少數日本工人和日本工頭還強迫中國工人干活，我們大伙沒有一個听他們的，誰也沒給他干。無奈何，他們就自己動手干，他們意圖是，想趁大伙不干活的空子，乘機巴結當頭的好不裁他們。翻砂廠有個壞種外號叫“冷虎子”的日本人，他就在大家不干活的時候，強迫中國工人和他一齊干活，這事被牛島和外號叫“張飛”的日本工人知道了。

这两位日本工人去到就把“冷虎子”拖出来打了一頓，經这次教育，后来他再不敢逼中国工人干活了。还有鍛冶厂有个外号叫“大地瓜”的日本工头，領几个专抱日本工头粗腿的日本工人干活，結果被台車厂的横山和旋盤厂的若本領着中日工人，砸开大門冲进去把“大地瓜”打跑了，还把大电淺砸坏了。横山和若本这两个日本工人，手艺高心眼好，从不打罵中国工人，他們反对日本工头打罵中国工人，因此，他二人在中日工人中很有威信。在这次中日工人反对裁人的联合罢工斗争中，领导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的联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罢工弄得日本資本家厂长哭笑皆非。我們上班后不但干活，倒給他浪費了不少电。制造廢品，损坏工具是常事。后来被“大駱”厂长知道了，經劝說工人都不听，无奈只好下令断絕电源。从此工厂就象死了一样，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响声了。

为了反对裁人，咱中国工人曾推举大工匠去見厂长，日本工人也选代表去見厂长，去見滿鉄本社理事和社長，但都沒得到答复。有一天中午，各職厂（車間）的中日工人就敲打着鉄桶、鋼板，拉起大队汇合到大賬房樓（厂部办公大楼）外，要厂长出来說話。厂长沒敢出来，派庶务科長出来說：工厂因为活少人多，大大的亏本，无论如何也要裁人的……。我們在气憤之下，就把大楼玻璃全都給砸了。不久民政署派来三、四百軍警进厂鎮压，更加严密地看守着重要部門，又把我們中日工人都給撵出工厂。这时，我們就聚集到工厂西边的小山上和工厂資本家对峙，坚持着罢工。

待罢工一个月后，在六月一日这天，有个叫什么“大陆劳动联盟会”的日本人組織，在沙河口运动場召开了大会。日本工人对咱中国工人讲了，这天中国工人也拉起大队和日本工人一起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后还示威遊行。日本工人选出二百名代表在第二天去民政署請愿。后来日本工人回来讲：民政署中野署長被迫和滿鉄本社联系，研究如何处理这一問題。滿鉄本社和横井厂长在中日工人的斗争威力下，不得不减少原计划的裁人数，并答应給被裁

工人一定数量的洋雇金。规定一九一七年前入厂干活的，发给工资的七成，一九一七年后入厂的发给三成，住工厂房子的延期使用两个星期。

根据那时的情形，想不让工厂裁人是不行的，又鉴于工厂当局答应对被裁工人发给解雇金，这样以来，工人们才出了口气。大伙都觉得，能争得这些条件，应看成是我们中日工人联合斗争的胜利结晶。实在是来自不易呀！

到六月十日（罢工四十余天），工厂在大批军警的弹压下，发给中日工人每人一封信，宣布了被裁和留用人员的名单。被裁人的信中装有解雇书解雇金字据；留用人的信中装有入厂证。被裁的中日工人，共有一千八、九百名（日本工人占五、六百人）。

四十天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至此就算结束了。虽然裁了一些工人，但是通过这次罢工，显示出我们工人的威力，迫使资本家不仅少裁人，而且对被裁的工人发给一些解雇金，使被裁的弟兄们暂时还有个生活着落。尤其通过这次罢工，给我们增加了知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只要大家抱住团体一条心，力量才大无穷。

刘 振 泉（印）

刘 金 有（印）

司 春 运（印）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对党领导下的旅师学运情况的回忆片断

(1921年~1927年)

尤 符 一

旅大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核实

1961年6月26日

旅大学生运动，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有了蓬勃地发展。学生罢课的频率，波及面的宽广、反帝的激烈程度和影响的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在党领导下的旅顺师范和二中学运更为活跃，而王将一同志就是旅顺学运直接参加者。为了搜集、核实这时期旅顺学运情况，我们曾两度访问了他。这份回忆录是根据我们提的问题，经他再三回忆，亲笔写成的。我们只做了个别文字的改动。下面就是几个主要问题经核实认定的根据：

一关于旅顺师范学校有党的组织问题，经陈一仁（当时为大连地委组织部长，后投敌叛党）、杨志云（当时为大连市支部書記，地委组织部长，后叛党）等认定属实，予以认定。

二关于旅大地下党在旅顺师范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组织等活动，经陈一仁、杨志云等认定属实，予以认定。

三关于“五卅”惨案发生后，旅顺各学校举行游行，散发传单等问题，与当时报纸报导一致，予以认定。

四关于旅顺师范学校一些罢课等活动，与当时报纸报导一致，予以认定。

对党领导下的旅顺学运情况的回忆片断

按：尤符一，1926年参加党的，曾参与旅顺学生运动，以后因大连党组织遭受破坏，失掉关系。现为中央对外贸易部党员，付处长。

(一)

1926年春宣布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朱寿春和李盛忠，并称这是经过大连党组织批准的。而他們两人是旅师当时地下党的组长。一个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还有刘煥彦、郭良茂、于庚田、石傳家、刘大川、鞠兴任等。当时我的年龄最小，李盛忠称我为四弟，意思是我們結成了骨肉相联的组织关系。

在白色恐怖的时期，我們对于党组织是严守秘密的，除李盛忠、朱寿春二人直接和大连党组织有联系外，我們不知道誰是大连党组织负责人，並一直没有全别的单位地下党组织发生过横的联系。大连的党组织数次派全志来召集党员秘密开会，都没有介绍过名字，只是有的说过姓邓。

1927年暑假后的初秋，朱寿春暗地里通知我說：“很不幸，党書記邓和高全志在大连被捕了，党组织被破坏了。我們必須警惕起来，但不要怕，因为党员名册燒掉了，沒有落到敌人手中，所以敌人对我們是沒有证据可以追查的。”

回忆地下党对于我們組織領導思想領導和宣傳工作是积极热烈关怀和严肃認真負責的。在党内生活中，我还记忆的有如下几点：

1925年7月朱寿春帶我从旅顺到大连沙河口旺阳街程污儉家。当时他热烈地鼓励我們学习馬列主义，吸收无产阶级思想。他說：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殖民地社会，除了革命是沒有出路的，只有走最进步的新的馬列主义革命道路才是无限光明的。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体系，要树

立这种新思想不是简单的过程，要下苦工夫学习，要作到老，要学到老。

后来党组织送来了大批刊物和书籍，其中有工人简讯，唯物史观等推动我们抓紧学习。

1926年秋党派来了一位清面红光的全志，召集党员秘密到“大正公园”后山开会。他讲过：“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的，又是国际主义的。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以马列主义真理武装广大劳动人民，全甘共苦坚决进行阶级斗争，全时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最可靠的全盟者。”当时有人问：我们能否到苏联学习一番？他说：这要看时局情况和条件。总之苏联是最忠实于马列主义的，坚决地支持我国广大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因此，我们深信一定能够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殖民地受压迫的人民。

1926年冬，在动员多数同学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音乐教官“青木”的旅师同学大会上，郭良茂强调牺牲精神，拔出短刀刺穿了他自己的大腿，血流不止，送医院救治两个多月，轰动一时。后来党内指示说：“坚持罢课斗争的勇气和热情是好的，但思想和作法不是马列主义的，这是一次错误，以后不要再这样作。因为马列主义教导革命人民不自己残害自己，要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付敌人也不主张采取暗杀行刺手段，而必须从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消灭它们。”

经过“青木”的罢课斗争胜利后，1927年春程运儉带着另一全志到鮑順“后乐园”，召集党员秘密开会，边走边谈，鼓励我们继续前进，並了解我们在旅师内的宣传工作，並且給以指示。到“大正公园”的亭子上嘱咐刘六川、鞠兴任要去水师营小学去找宣传对象。当时李盛恩对他說我（尤符一）新近訂婚，对方是个小学教員，他很高兴地嘱咐我赶快多作